



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业务资讯

上海市律师协会

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第 12 期]

主任：

王思维

副主任：

傅建平

沈 宁

蔡正华

编辑人员：

冯思华 李瑞阳

李 治 刘水灵

苏 琬 张 喆

祝天剑

执行编辑：

桂雅婷

■ 行业简讯

- P1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 P2 上海律协刑法与刑事辩护、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举办浦江刑辩夜话（第五期）
- P6 上海律协刑诉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会顺利召开

■ 新法速递

- P9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
- P2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
- P31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

■ 刑辩实务研究

- P4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
- P5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
- P65 最高检发布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
- P85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辖区基层法院共同发布刑事审判白皮书



行业简讯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11 月 29 日，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下称“研究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会议通报研究会主管单位变更情况，并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当选为第八届理事会会长，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苗生明当选为执行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宋英辉等 18 位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当选为副会长。会议选举产生 128 名理事、37 名常务理事。

会议提出，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要紧紧围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理论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坚持突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要发挥研究平台优势，推出更多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强化对外交流协作，推动形成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合力。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面临的时代背景和整体形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开创研究会各项工作新局面，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以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上海律协刑法与刑事辩护、刑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举办浦江刑辩夜话（第五期）

来源：日盈律师事务所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上海律协“浦江刑辩夜话”第五期于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培训室圆满举办。本次夜话由上海律协刑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下称“刑法委”）、刑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下称“刑诉委”）主办，由日盈所承办，以“案例辩论与刑事辩护中的语言表达”为主题，共邀请上海律协会员近百人参加。日盈所执行副主任韦玮、管委会委员洪梓桢、合伙人刘水灵出席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日盈所合伙人、刑诉委干事刘水灵作为主持人宣布开场。她向莅临本次活动的全场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介绍活动背景与议程，并就日盈所及日盈刑辩业务中心概况简要介绍。

而后，日盈所执行副主任韦玮代表律所致欢迎词。他表示，日盈成立之初就设立了刑辩业务中心，刑辩技能培训对青年律师培养有着重要作用，日盈十年发展也与刑辩业务息息相关。恰逢十周年乔迁新址，日盈很荣幸为年轻律师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与平台，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多来日盈总部做客交流。

上半场以“案例辩论与刑事辩护庭审活动的关系”为题，由刑法委委员荆亚斌带来。他聚焦辩论的尺度、维度和力度，探讨了案例辩论与庭审的“术”与“道”，并围绕“为什么要进行法

庭辩论？”“如何掌控庭审辩论？”“如何巧妙引起共情？”三个问题展开详细论述。结合案例，他还揭示了做好法庭辩论的两个要点。

而后，刑诉委干事李治、刑法委委员孙慧婷、刑诉委委员武海亮作为与谈人依次发言。李律师提出案例辩论和庭审活动有不少正面关联，案例辩论中积累的能力能在庭审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同时案例辩论也能锻炼刑事律师在庭审中更好地调整节奏。孙律师认为案例辩护是有限时间内控辩双方的争论，而刑事辩护则是有限时间内为被告人合法权益做辩护，两者在“辩题答案唯一性”、“共情部分”也有一定区别。武律师讲述了案例辩论与庭审活动的区别，案例辩论是基于预设情节进行结论性推断，而实际庭审要求律师基于证据材料还原事实。

总结环节，上海市律师辩论队教练组成员郜嘉奇分享了参加辩论训练的经典案例。他从案例辩论与庭审的异同出发，揭示了两者在事实、逻辑、价值方面的相同，以及语言风格、重心、辩论方式上的不同，并建议将案例辩论的思维借鉴到刑事辩护中。

下半场以“刑事辩护庭审活动中的语言技巧”为题，由刑法委委员、日盈所管委会委员洪梓桢带来。洪律师首先阐述认罪认罚背景下庭审实战技能业务培训的必要性，随后由表达内容、表达技巧、表达训练三方面展开。针对表达内容，他由“以公诉思维思考问题”“以指控逻辑搭建框架”“以驳论方式组织语言”

的框架层层展开，提出了三个注意要点。接着，他就结构、节奏、情感、咬字等表达技巧分享了经验心得，并就积累以及结构、表达、思维的训练分别提供参考思路。

主题演讲完毕，与谈人依次发言。首先，刑法委委员、上海律师辩论队总教练周乐多结合实际办案经历，就语言技巧在庭审辩护中的作用进行分享。他认为刑辩律师在庭审中要尽量口语化，建议脱稿或者半脱稿。基于辩论队训练新成员的经验，他也向大家分享了训练表达自信的方法。

接着，刑诉委委员丁俊涛围绕刑辩实践分享了五个庭审表达习惯：法庭上自报家门表明身份、庭审中整合提炼公诉人观点、避免激化矛盾、被打断后释明发言合理性、善用比喻高效表达观点。

而后，刑诉委委员曾钧泓总结了庭审表达的注意事项：第一，重传递而非输出，包括框架结构化、观点标题化、短句分段化的三要点。第二，重表达而非纯念经，包括口语调整、结合现场因素、学会审时度势等增加现场感的三要点。第三，重说服而非纯表演。

随后，刑法委委员胡婧发表总结。结合十余年公诉工作经验，她认为庭审的核心是实质性有效观点的表达，并阐述了语言技巧的重要性。围绕演讲人及与谈人的分享，她就发问语气语调的区分等内容展开补充，并就庭审辩论中的价值提升分享了观点。最

后，上海律协副会长徐宗新受邀发表总结点评。他回顾本期浦江刑辩夜话选题初衷，并结合整晚嘉宾精彩发言总结出关键问题：辩论有没有用？辩论技能要不要练？辩论技能怎么练？庭审中如何表达？他认为辩论是锤炼语言技巧技能的好方法，肯定了辩手的特长，也建议他们在实务工作中调整语言风格，以平和的态度开展沟通，注重刑事辩护十项技能的全面锻炼。

合影后，上海律协“浦江刑辩夜话”第五期圆满结束，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感受颇深，并对下一期交流充满期待。

上海律协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会顺利召开

来源：华诚律师事务所

2024 年 12 月 24 日下午，上海律协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刑诉委”）在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召开了 2024 年年终总结会议。

本次会议邀请了第十二届上海律协副会长徐宗新，上海律协监事、上海律协资产与财务专项监督委员会主任、第十一届上海律协副会长潘书鸿，上海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建，第十一届上海律协刑法委副主任寇树才，上海律协反舞弊和刑事风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顾伟、李天航、罗根达等多位嘉宾出席。刑诉委主任王思维、副主任沈宁、傅建平、蔡正华以及刑诉委委员、干事参加会议。上海律协专业委监督委员会委员魏来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刑诉委秘书桂雅婷主持。

本次会议分为 2024 年年终总结与主题研讨两个环节。首先由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钱军亮和上海律协副会长徐宗新分别为会议致欢迎词和开幕词。

致辞之后进入 2024 年年终总结环节，会议通过一则视频对刑诉委 2024 年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由刑诉委副主任沈宁从积极履职、建言献策、业务研究、执业权利保障等方面对 2024 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由刑诉委副主任傅建平对 2025 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通报，希

望全体委员能够汇智共进，笃行致远，在举办大型培训、专业研讨、撰写研究文章、加强内外交流、对外互联互通与护航律师维权等方面作出成绩和贡献。

会议第二部分为主题研讨环节，本次会议设置了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为：“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的交叉”，由刑诉委委员宋雷昌、张佰乐、金建锋发言，刑诉委委员刘华英进行点评；第二个议题为“上海刑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执业环境优化”，由刑诉委委员冀军辉、牛凯、荀大鹏、杨晓倩、徐亦发言，刑诉委委员丁俊涛进行点评；第三个议题为“刑民交叉、行刑衔接对刑事辩护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由刑诉委委员虞佳臻、曾钧泓、刘骏发言，刑诉委委员田磊进行点评；自由发言环节，刑诉委委员朱蓓春等多位委员参与与谈。各位发言人与点评人从学术法理、司法实务、典型案例等角度围绕上述议题分享自己的观点与经验。

发言结束后，各位嘉宾为 2024 年内获得各个奖项的委员和干事颁发奖状证书。

会末，反舞弊和刑事风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顾伟，上海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建，上海律协监事、上海律协资产与财务专项监督委员会主任、第十一届上海律协副会长潘书鸿分别讲话，表达了对各位委员工作的认可与勉励。

最后，刑诉委主任王思维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并对本次

会议中委员反馈的问题予以积极回应。会议结束后，参会嘉宾和委员干事，在华诚所大堂合影。

本次会议，由刑诉委副主任沈宁、委员刘华英、干事李瑞阳、秘书桂雅婷，和华诚所市场部、行政部共同筹备。华诚所为本次会议提供了全程协助。



新法速递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化审查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下称《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下称《专门审查指引》），着力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化审查，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据悉，为深化落实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解决伤害类案件中的专业技术难题，提升伤害类案件办理质效，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与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组成专班，历时一年多，共同研究制定了《工作规定》和《专门审查指引》。

《工作规定》是刑事检察部门首次会同检察技术部门对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将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均涵盖在内，明确实质化审查的对象是技术性证据及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同时还结合伤害类案件特点，阐明不同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的要求与重点，比如《工作规定》第 9 条主要涉及损伤形成时间的审查，重点提

示应当注重区分新鲜伤与陈旧伤，排除与案件无关的陈旧性损伤或自身病理改变的影响。

《专门审查指引》聚焦案件办理，具体规定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两份以上不同鉴定意见的专门审查、颅面四肢等九大部位不同类型常见损伤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专门审查等内容，以及医学影像学检查等专科检查的专门审查内容，同时强调对作出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也要进行审查，这有助于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

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表示，两份文件还对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作出规定，明确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各自的审查重点、协作程序、工作要求、配合机制等，合力破解专业难题。检察官将强化对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的实质审查，通过检察技术人员的协助着力推动案件专门性问题的质效解决。检察技术人员将从技术性证据的矛盾点和争议点发力，以专门审查促进实质审查，全面提升法律监督效能，通过检察一体履职，切实贯彻落实好“高质量办好每一个案件”。

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审查实质化，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伤害类案件，是指行为涉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破坏他人身体机能的刑事案件。

第三条 本规定中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及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运用专业技术知识、逻辑和经验，对其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和科学性进行全面审查的活动。

第四条 开展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应当遵守法律规定，遵循技术标准和规范，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审查、科学解释原则。

第五条 检察官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审查判断技术性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反映案件事实，发现和排除技术性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技术性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技术性证据之间的矛盾。需要对技术性证据进行专门审查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交

由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检察技术人员应当运用专门知识，审查技术性证据及其基础性材料，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技术支持。

第六条 对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的审查，应当着重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检材是否可靠，鉴定时机是否适当，鉴定标准是否有效，鉴定方法和过程是否科学，鉴定依据是否充分，论证分析是否客观、全面、严谨，鉴定意见是否明确，鉴定意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等。

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审查评定损伤程度、残疾等级依据的病历资料、检材是否完整、可靠，被害人后续治疗及恢复情况的相关材料是否收集移送，鉴定机构在伤情认定、标准适用方面是否符合专业规范要求，不同鉴定意见产生矛盾的原因等。

第七条 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成伤机制或致伤方式的，应当依据损伤的类型、部位、大小、程度、形态、分布等特征，结合案情和现场勘验、视听资料等情况，综合损伤形成过程及致伤物特征进行分析判断。着重审查损伤的性质、外力作用的

方式、伤情新旧程度、损伤发生的生物力学或者病理生理学机制，排除诈伤（病）、造作伤、陈旧伤与攻击伤等。结合骨折部位与受力部位区分直接外力或是间接外力；结合损伤部位、形态、分布、试切创等特征排除造作伤。

第八条 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伤病关系的，应当调取与鉴定有关的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等基础性材料，着重审查损伤或者疾病是否符合医学转归规律，分析既往损伤或疾病与本次损伤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医疗介入因素等，综合判断伤病关系鉴定意见是否客观、准确。

通过审查致伤过程、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诊疗过程等，综合分析病理过程的连续性和时间间隔规律性。对于损伤与既往伤、病并存，损伤独自存在不能造成现有后果的，应着重审查是否对损伤程度降级评定或者不作评定。

第九条 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损伤形成时间的，应当依据损伤的形态特征，区分新鲜伤与陈旧伤，重点关注损伤的愈合过程及其动态变化，结合骨痂形成时间、创口愈合周期变化等，排除与案件无关的陈旧性损伤或者自身病理改变。

第十条 对勘验、检查笔录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证据收集、制作程序是否合法，通过审查勘验、

检查笔录，根据作案工具、打斗痕迹、现场血迹分布等还原案发现场状况，判断犯罪嫌疑人案发时是否在现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过程等。

第十一条 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反映案件现场的录音、录像资料的来源，对提取情况是否有明确记录；现场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封存完好，形式要件是否齐备；录音、录像资料是否经过技术处理或者剪辑。注重审查视听资料显示时间与实际时间是否存在误差，是否有侦查人员、视听资料所有人、见证人签字捺印的时间校对说明，是否能够完整体现造成人身伤害的全过程等。

第十二条 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电子数据的来源，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形式要件是否齐备，电子数据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确保电子数据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注重审查涉案的微信记录、手机短信记录、网上聊天记录、手机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判断造成伤害后果的主观心态，是否共同犯罪，有无预谋、纠集、分工、实施等。

第十三条 在技术性证据审查过程中，发现证据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依法及时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

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第十四条 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中，检察官可以就有关专门性问题向检察技术人员咨询，或者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列席检察官联席会议、参与案件会商研究等，协助解决专门性问题或者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鉴定人、证人等，调取与技术性证据相关的基础性材料，或者补充收集其他有关证据时，可以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协助。

第十五条 检察官在办理伤害类案件中，发现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委托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

（一）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以上鉴定意见且相互矛盾无法排除的；

（二）起关键性作用的技术性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且无法排除的；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等对技术性证据提出异议，足以影响证据采纳的。

第十六条 检察官在办理伤害类案件中，发现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委托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

（一）对技术性证据中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等有疑问的；

（二）对技术性证据材料涉及的鉴定时机、致伤物推断、成伤机制、伤病关系等专业技术问题有疑问的；

（三）技术性证据材料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等关键性问题，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四）对技术性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材料间存在的矛盾有疑问的；

（五）其他需要委托专门审查的情形。

第十七条 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补充鉴定：

（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明显遗漏的；

（二）发现新的有鉴定意义的证物的；

（三）对原鉴定证物有新的鉴定要求的；

（四）鉴定意见不完整，委托事项无法确定的；

（五）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

第十八条 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鉴定：

（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的；

（二）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三）送检材料不真实或者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四）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的；

（五）有证据证明鉴定意见确有错误的；

（六）其他可能影响鉴定客观、公正情形的。

重新鉴定时，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第十九条 检察官委托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委托手续，移送相关证据材料。本院无相应专业检察技术人员的，可以按规定委托上级检察技术职能部门办理。

第二十条 检察技术职能部门接受委托后，应根据委托事项，依据相关规定，一般应在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出具

相关文书。对于疑难复杂、补充材料等情形需要延长审查时间的，应向委托部门说明原因后及时办理。

对伤害类案件中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按照《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等规定执行。

检察技术人员对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第二十一条 检察技术人员出具专门审查意见后，应当及时向检察官解释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必要时协助检察官开展重新鉴定、补充鉴定、补充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等工作，进一步完善证据体系。

第二十二条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可以作为检察官判断运用证据或者作出相关决定的依据，必要时可以提交法庭。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必要时，检察官可以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协助做好法庭讯问、询问、举证、质证、辩论等庭审中可能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四条 伤害类案件法庭审理中，检察官可以向法庭申请检察技术人员出庭，就相关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技术人员有必要出庭的，检察技术人员应当出庭就审查意见进行解释说明。

第二十五条 对伤害类案件中涉及的疑难复杂专门性问题，检察官、检察技术人员可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费用参照相关规定从办案经费中列支。

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参加刑事和解、公开听证、公开宣告、当面答复等活动，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解释说明。

在开展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中发现可能影响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和科学性的普遍性问题，检察官可以在检察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对相关事项开展调查核实，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第二十六条 技术性证据的专门审查交由检察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的，参照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

(2024年12月2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权责对等，严格监督；遵守法定程序，公正履行职责；尊重和保障人权，在适用法律上平等，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

三、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监察委员会可以向本级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辖区内特定区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本级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国有企业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可以向驻在单位的下一级单位再派出。

“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可以向驻在单位管理领导班子的普通高等学校再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监察机构，可以向驻在单位管理领导班子的国有企业再派出。”

将第二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对派驻或者派出它的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机构、监察专员负责。”

四、将第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监督、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保密。”

五、将第十九条修改为：“对可能发生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进行函询，要求说明情况。”

六、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在调查过程中，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谈话，要求其就涉嫌违法行为作出陈述，必要时向被调查人出具书面通知。”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监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经依法审批，可以强制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到案接受调查。”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被调查人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对其采取责令候查措施：

“（一）不具有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形的；

“（二）符合留置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系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三）案件尚未办结，但留置期限届满或者对被留置人员不需要继续采取留置措施的；

“（四）符合留置条件，但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责令候查措施更为适宜的。

“被责令候查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监察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直辖市、设区的市的城市市区或者不设区的市、县的辖区；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监察机关报告；

“（三）在接到通知的时候及时到案接受调查；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

“被责令候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予以留置。”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对于未被留置的下列人员，监察机关发现存在逃跑、自杀等重大安全风险的，经依法审批，可以进行管护：

“（一）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自动投案人员；

“（二）在接受谈话、函询、询问过程中，交代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问题的人员；

“（三）在接受讯问过程中，主动交代涉嫌重大职务犯罪问题的人员。

“采取管护措施后，应当立即将被管护人员送留置场所，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十、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直接或者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调查人员主持下进行勘验检查。勘验检查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必要时，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调查实验。调查实验情况应当制作笔录，由参加实验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十一、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调查人员应当依法文明规范开展调查工作。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严禁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企业经营者协助调查的，应当保障其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十二、将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调查人员采取讯问、询问、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等调查措施，均应当依照

规定出示证件，出具书面通知，由二人以上进行，形成笔录、报告等书面材料，并由相关人员签名、盖章。”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或者管护措施，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经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强制到案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需要采取管护或者留置措施的，强制到案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不得以连续强制到案的方式变相拘禁被调查人。

“责令候查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监察机关采取管护措施的，应当在七日以内依法作出留置或者解除管护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

十四、将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改为第四十七条。

十五、将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省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延长留置时间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或者不需要继续采取留置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变更为责令候查措施。”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监察机关依照前款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调查终结的，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

“省级以上监察机关在调查期间，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另有与留置时的罪行不同种的重大职务犯罪或者同种的影响罪名认定、量刑档次的重大职务犯罪，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批准或者决定，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重新计算留置时间。留置时间重新计算以一次为限。”

十六、将第四十三条第三款改为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监察机关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措施，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省级以下监察机关留置场所的看护勤务由公安机关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留置场所的看护勤务由国家另行规定。留置看护队伍的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十七、将第四十四条改为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采取管护或者留置措施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管护

人员、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有碍调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管护人员、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解除管护或者留置的，应当及时通知被管护人员、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管护人员、被留置人员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变更管护、留置措施。监察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将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强制到案人员、被管护人员以及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对其谈话、讯问的，应当合理安排时间和时长，谈话笔录、讯问笔录由被谈话人、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名。”

将第三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被管护人员、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管护、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监察机关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应当依法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性质认定、程序手续、涉案财物等进行全面审理，形成审理报告，提请集体审议。”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五条，修改为：“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被调查人逃匿或者死亡，有必要继续调查的，应当继续调查并作出结论。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二十、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会同有关单位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在反腐败方面开展引渡、移管被判刑人、遣返、联合调查、调查取证、资产追缴和信息交流等执法司法合作和司法协助。”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从各方面代表中聘请特约监察员。特约监察员按照规定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实行监督。”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四条：“监察人员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为防止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恶

劣影响，监察机关经依法审批，可以对其采取禁闭措施。禁闭的期限不得超过七日。

“被禁闭人员应当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监察机关经调查发现被禁闭人员符合管护或者留置条件的，可以对其采取管护或者留置措施。

“本法第五十条的规定，适用于禁闭措施。”

二十三、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有权向该机关申诉：

“（一）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或者禁闭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或者变更的；

“（二）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超出涉案范围的财物的；

“（三）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不解除的；

“（四）贪污、挪用、私分、调换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五）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侵害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侵害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二十四、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七十四条，第七项修改为：

“（七）违反规定采取强制到案、责令候查、管护、留置或者禁闭措施，或者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解除或者变更的”。

将第八项修改为：“（八）违反规定采取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措施，或者不按规定解除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措施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九项：“（九）利用职权非法干扰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侵害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本决定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

反向衔接工作坚持严格依法、客观公正、过罚相当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下称《指引》），旨在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保障和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

行刑反向衔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指引》规定，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要坚持严格依法、客观公正、过罚相当，加强跟踪，促进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

《指引》提出，检察机关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具体负责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依法审查是否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并做好案件移送、分析汇总、沟通协调等工作。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自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过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将案件移送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

对于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审查,《指引》要求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自登记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审查终结,重点围绕在案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被不起诉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和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审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全面客观公正叙述案件事实,依法提出制发检察意见或终结审查的处理意见。

《指引》明确,承办检察官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检察意见书》。《检察意见书》应当包括被不起诉人的违法事实、情节及证据,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以及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情况等内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认为需要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层报与该行政主管部门同级的检察院决定并提出。

《指引》对案件的跟踪督促进行了规定,要求《检察意见书》应当载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检察意见书》之日起九十日内,将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书面回复检察机关。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检察意见书》后具有不予回复、不予行政立案、无正当理由不予行政处罚等违法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督促其纠正。

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和规范检察机关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行刑反向衔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并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坚持严格依法、客观公正、过罚相当，加强跟踪，促进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四条 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具体负责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依法审查是否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并做好案件移送、分析汇总、沟通协调等工作。

刑事检察部门对依法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移送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审查是否应对被不起诉人提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

未成年人检察、知识产权检察等综合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的专门检察部门按照分工和管辖案件类别，统筹履行行刑反向衔接相关工作职责。

第二章 受理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刑事检察部门自作出不起诉决定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过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将案件移送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并同步移送不起诉案件审查报告、不起诉决定书、相关证据材料等。

刑事检察部门移送决定不起诉案件时，可以提出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第六条 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应当审查刑事检察部门移送的材料是否齐全。材料不齐全的，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应当告知刑事检察部门补齐相关材料后接收。

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接收案件材料后，应当及时登记并将案件分配给检察官办理。

第三章 审查

第一节 审查程序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制发检察意见，既要审查依法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也要审查是否有必要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当围绕在案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被不起诉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和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

- （一）被不起诉人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 （二）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提出检察意见：

-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 （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已经予以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

（六）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或情节轻微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

（七）当事人因同一违法行为已受到行政处罚的；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不提出检察意见：

（一）违法行为超过行政处罚时效的；

（二）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五）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且法律、行政法规未另行规定的；

（六）具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确需调查核实的，依照《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自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登记受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审查终结。

征求异地人民检察院意见的期间，不计入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审查期限。

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可以报请检察长延长审查期限。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审查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审查并制作《中止审查决定书》：

（一）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要求复议或者提请复核的；

（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提起申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的；

（三）被不起诉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提起申诉的。

经复议、复核、复查，未变更、撤销不起诉决定的，自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收到复议、复核、复查决定之日起恢复审查。

对被害人刑事自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的，自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收到裁定文书之日起恢复审查。

第十四条 承办检察官对审查认定的事实负责。审查终结后，应当制作审查终结报告。审查终结报告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叙述案件事实，依法提出制发检察意见或终结审查的处理意见。

审查终结报告应当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刑事案件审查情况、审查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审查意见、风险评估预警等内容。

刑事检察部门对被不起诉人是否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提出的意见，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拟不采纳的，应当在审查终结报告中说明不采纳的理由。

第十五条 承办检察官审查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终结审查决定书》，报检察长批准：

（一）刑事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不起诉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被不起诉人的违法行为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依据或者行政处罚依据已经失效的；

（三）具有本指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决定不提出检察意见的；

（四）具有本指引第十条规定的情形的；

（五）不起诉决定被撤销的；

（六）人民法院对被害人提起的刑事自诉案件作出判决，追究被不起诉人刑事责任的。

对符合前款情形的，可以简化制作审查终结报告。

第二节 检察意见

第十六条 承办检察官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检察意见书》，报检察长批准。

《检察意见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一）主送单位名称；
- （二）案件来源；
- （三）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基本情况；
- （四）采取和解除羁押性强制措施情况；
- （五）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情况；
- （六）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情况；
- （七）被不起诉人的违法事实、情节及证据；
- （八）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 （九）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回复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的期限。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意见书》之前，可以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八条 作出不予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层报与该行政机关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提出。

作出不予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向下级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指令对应的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

作出不予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异地提出检察意见的，应当书面征求行政机关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意见。行政机关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是否同意提出检察意见并说明理由。意见不一致的，层报共同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应当自定制发《检察意见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连同不予起诉决定书、相关证据材料等一并送达有关行政机关，并将《检察意见书》抄送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对于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检察意见书》抄送其上级行政机关。

第二十条 《检察意见书》应当载明有关行政机关自收到《检察意见书》之日起九十日内，将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因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处理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回复期限。

第三节 跟踪督促

第二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后，应当持续跟踪后续处理情况，存在分歧的，应当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

第二十二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检察意见书》后具有不予回复、不予行政立案、无正当理由不予行政处罚等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督促其纠正。

第二十三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存在本指引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除依法督促其纠正外，经检察长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通报其上级机关。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发现需要对被不起诉人给予政务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将案件线索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当按照规定立卷归档。

第二十六条 未成年人检察、知识产权检察等综合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的专门检察部门，对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没有特殊规定的，参照本指引办理。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当加强与刑事检察部门的沟通，并将提出检察意见和行政主管部门采纳情况及时反馈刑事检察部门。

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当加强与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证据材料移交、接收衔接，建立健全案件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机制。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指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院之前公布的其他规定与本指引内容不一致的，以本指引为准。



刑辩 实务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蝇贪蚁腐”，事关民生福祉，事关人心向背，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执政根基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决不手软，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腐败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6 件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聚焦保障民生领域。6 个案例分别系发生在住房保障、教育招生、医疗保险、劳动就业、财政税收、征地拆迁领域的腐败犯罪，被告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人民法院零容忍惩治民生领域“蝇贪蚁腐”的坚定决心。二是坚持全链条惩治。齐某刚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被告人负责审批公租房申请，既受贿、又行贿，既徇私滥权、又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钟某燕受贿、洗钱案，被告人受贿后又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进行洗钱，人民法院依法分别予以定罪量刑并数罪并罚。同时加大财产刑适用和追赃挽损力度，强化全链条惩治，形成有力震慑。三是贯彻落实宽严

相济。吴某鹏贪污、受贿、诈骗案，被告人贪污、受贿、诈骗数额均特别巨大，且未退赃退赔，依法数罪并罚顶格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贪污案，被告人贪污数额巨大，但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反腐败斗争必须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惩治“蝇贪蚁腐”的重要政治意义，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依法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齐某刚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

——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

【基本案情】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12 月，被告人齐某刚利用担任某市某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保障性住房科科长职务上的便利，为贾某、苗某磊、王某岭（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公租房申请、房源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取财物共计 157 万元。

被告人齐某刚为了让某区某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公租房申请审核

工作的杜某进（另案处理）违规审核苗某磊上报的公租房申请材料，给予杜某进现金 3 万元。

被告人齐某刚明知公租房申请材料不符合申请条件，仍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违规审批公租房申请 132 份，涉及公租房 121 套。经审计，市场租赁价格总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的应交房租总金额的差价为 323 万余元。

被告人齐某刚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审核公租房申请材料，致使 232 套公租房被不符合条件人员居住。经审计，市场租赁价格总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的应交房租总金额的差价为 566 万余元。

【办理情况】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齐某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综合考虑齐某刚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受贿罪判处齐某刚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齐某刚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保障性住房是我国住房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负责保障性住房审批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规审批，严重破坏保障性住房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应当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齐某刚为他人公租房申请、房源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既受贿，又行贿；既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审批公租房申请，又玩忽职守，不认真审核申请材料，共计造成经济损失 889 万余元。人民法院依法对齐某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追缴犯罪所得，充分体现了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深入纠治侵害民生领域“蝇贪蚁腐”的坚定决心，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良好效果。

二、钟某燕受贿、洗钱案

——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

【基本案情】

2010 年至 2023 年，被告人钟某燕利用担任某市某实验小学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学生在入学、转学、分班及项目承接、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949 万余元。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钟某燕将其收取的好处费 123 万余元，通过转账

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

另查明，被告人钟某燕到案后如实供述受贿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不掌握的洗钱犯罪事实。

【办理情况】

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949 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通过转账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钟某燕所犯受贿罪具有坦白、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所犯洗钱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钟某燕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例。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系着千万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本案中，被告人钟某燕利用担任学校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将教育资源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严重破坏教育公平公正。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受贿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

追缴犯罪所得，彰显了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坚决维护教育公平的鲜明态度。

三、李某贪污案

——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贪污犯罪

【基本案情】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某市某镇政府医保所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收取辖区村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41 万余元，其中 14 万元在医保系统中核定缴纳，剩余 27 万余元被李某侵吞并用于个人房屋装修、生活开支等。

另查明，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缴全部犯罪所得。

【办理情况】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李某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医疗保

险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医保制度健康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私自截留侵吞村民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李某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对李某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彰显了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蝇贪蚁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鲜明立场。

四、惠某强贪污案

——依法惩处就业领域贪污犯罪

【基本案情】

2020 年 10 月至 2022 年 6 月，被告人惠某强利用担任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保科负责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先后套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计 153 万余元。

另查明，被告人惠某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缴全部犯罪所得。

【办理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惠某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套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计 153 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惠某强具有自首、全额退赃

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惠某强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就业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就业领域腐败犯罪，不仅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也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惠某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套取劳动就业各项补贴，是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惠某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对惠某强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推动就业领域反腐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彰显司法为民的担当与作为。

五、吴某鹏贪污、受贿、诈骗案

——依法惩处税收领域贪贿犯罪

【基本案情】

某市某镇政府安排该镇农业经济技术综合推广中心独资成立某矿产品贸易公司，利润用于支持发展当地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2012年至2020年，被告人吴某鹏利用担任某市某镇副镇长、镇长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提高税收扶持奖励比例、虚列税收扶持奖励资金等方式，

通过某矿产品贸易公司等单位套取国家财政资金 1086 万余元。吴某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552 万余元。吴某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工程保证金 100 万元。截至一审宣判前，吴某鹏未退赃退赔。

【办理情况】

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家财政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诈骗罪。吴某鹏虽具有坦白情节，但未退赃退赔，综合考虑吴某鹏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判处吴某鹏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贪污、受贿犯罪所得，责令退赔诈骗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税收领域贪贿犯罪的典型案例。国家对纳税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扶持奖励，对于有效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被告人吴某鹏身为国家工作

人员，在执行税收扶持奖励政策时，采取提高税收扶持奖励比例、虚列税收扶持奖励资金等方式，套取本应用于扶持企业发展的国家财政补贴，案发后又未退赃退赔，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人民法院依法对吴某鹏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释放了对税收领域贪贿犯罪严惩不贷、决不姑息的强烈信号。

六、何某平贪污案

——依法惩处征地拆迁领域贪污犯罪

【基本案情】

2017 年至 2020 年，被告人何某平利用担任某县某镇政府征地小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负责工业园区征地工作期间，伙同他人（均另案处理）采取虚报征地面积、青苗数量等方式，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 225 万余元。何某平分得 121 万余元。

【办理情况】

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何某平具有坦白、部分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何某平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征地拆迁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征地拆迁补偿款本应用于补偿受征地拆迁影响的当地居民，侵吞征地拆迁补偿款，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必须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征地面积、青苗数量等方式，骗取征地补偿款 225 万余元。人民法院对何某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起到良好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 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偷拍盗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的不法分子在宾馆、民宿等场所安装窃听、窃照设备窥探他人隐私，甚至提供互联网链接供他人实时观看或者将偷拍盗摄内容制成图片、音视频进行贩卖、传播，有的利用窃听、窃照设备从事非法调查、敲诈勒索、作弊诈赌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安全感，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同时，一些不法分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设备，致使窃听、窃照设备流入社会，成为偷拍盗摄乱象的重要推手。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严惩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深入推进偷拍盗摄黑灰产业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现发布 4 件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一是坚持依法严惩。案例一中，被告人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在宾馆房间安装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销售牟利，人民法院充分考虑违法所得等情节，分别认定五人的

行为属于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案例三中，人民法院综合被告人闫某坤等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经营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衍生次生犯罪等因素，认定闫某坤等三人的行为属于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彰显重拳出击、从严惩治的立场。

二是强化全面保护。案例四中，被告人陈某非法改装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并售卖；案例二中，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将窃照专用器材安装于酒店房间用于偷拍；案例一中，被告人石某等在宾馆房间安装偷拍设备偷拍并制作成视频贩卖牟利。相关案例涵盖窃听、窃照设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以及偷拍盗摄内容传播等各环节，释放了人民法院对偷拍盗摄黑灰产业进行全环节打击，坚决斩断利益链条的强烈信号，彰显了人民法院全方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良好秩序的坚定立场。

三是深化法治宣传。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案设备种类上，既有公司生产的窃照专用器材，又有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等自行改装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涉案设备用途上，既有用于偷拍他人隐私，又有用于作弊诈赌。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揭露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内幕和惯常操作，特别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保护意识，在工作、生活中警惕偷拍盗摄风险，提高识别、防范能力，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持续

提高打击治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工作质效，坚决斩断偷拍盗摄黑灰产业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案例一、石某等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

【基本案情】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1 月，被告人石某先后伙同被告人吴某东、田某君、吴某华、罗某靖等人，经事先预谋，在多家宾馆、酒店房间内安装偷拍设备，偷拍入住旅客的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发布贩卖信息进行销售牟利，共非法获利 29 万余元。其中，石某负责在宾馆、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并对偷拍的视频进行加工、销售，吴某东、田某君、吴某华、罗某靖协助石某安装偷拍设备并提供收款账户收取违法所得等。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以牟利为目的，非法使用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其中，石某、吴某东情节特别严重，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石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石某、

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偷拍盗摄黑灰产业犯罪的典型案例。公民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不受侵犯。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将偷拍设备安装在宾馆、民宿等场所进行偷拍盗摄，甚至提供互联网链接供他人实时观看或者将偷拍内容制成图片、音视频进行传播，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本案中，石某等人以牟利为目的，使用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予以贩卖，不仅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而且相关视频具有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符合刑法对“淫秽物品”的界定，触犯了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并综合违法所得等因素，认定石某、吴某东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认定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偷拍

盗摄黑灰产业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鲜明态度。

案例二、颜某平、颜某建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案

【基本案情】

2021 年 3 月以来，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为了偷拍他人隐私，在电商平台购买窃照专用器材，分别安装在三家酒店的多个房间内，使用手机 APP 将窃照专用器材与酒店房间内 WIFI 和自己的手机配对连接，并设置了远程使用手机 APP 观看房间内实时监控录像、回放录像、下载录像的功能。颜某建、颜某平通过手机 APP 实时观看时，若发现酒店房间内有人发生性行为，就将相关视频和截图下载至手机观看、保存并存储于颜某建的笔记本电脑内。2021 年 10 月 7 日晚，旅客唐某某发现房间内安装有窃照器材，随后联系酒店并报警。

【裁判结果】

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颜某平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颜某建自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颜某平、颜某建均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理。根据颜某平、颜某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颜某平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判处颜某建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

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偷拍盗摄乱象的典型案列。一些人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非法获取他人的经营信息或者个人隐私，给单位和公民的正常工作、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等人身权利，扰乱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本案中，颜某平、颜某建将窃照专用器材安装于酒店房间，用于偷拍住店旅客，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干扰了酒店的正常经营，严重侵犯他人隐私，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人民法院根据颜某平、颜某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体现了坚决打击此类犯罪的严正立场。此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在日常居家、旅游出行过程中，要注意个人隐私保护，一旦发现被窃听偷拍，应当及时报警；宾馆、民宿等也要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采取必要的防范、检查措施，合力消除隐患。

案例三、闫某坤等人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

【基本案情】

2020 年开始，被告人闫某坤在其成立的北京、杭州、广州工作室，伙同其招募的被告人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及卞某蛟（另案处理）等人销售从广州某公司购入的用于赌博出千的 A 系列主机及其配件等产品，部分产品销售至绍兴市越城区。A 系列主机外观和普通手

机一样，侧边有改装的微型摄像头，内置软件，侧边摄像头偷拍识别后，软件会帮助计算玩法从而获利。其中，闫某飞负责北京工作室的销售工作，汪某燕负责杭州工作室的销售工作。孙某勤在北京工作室负责收发货、客服、记账等工作，并参与产品销售。经查证，闫某坤等人案发期间从广州某公司至少购入价值人民币 2950 万余元的 A 系列主机及配件，并予以销售。其中，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1350 万余元，杭州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1400 万余元，孙某勤参与期间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197 万余元。经鉴定，从北京、杭州、广州不同销售渠道查获的 A 系列主机检材均为窃照专用器材。相关设备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衍生了参与人员广泛、被害对象众多、犯罪数额巨大的次生犯罪。

【裁判结果】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等人违反国家对窃照专用器材的管理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共同犯罪中，闫某坤起主要作用，属主犯；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从犯，分别对闫某飞、汪某燕予以减轻处罚，对孙某勤予以从轻处罚。闫某飞、孙某勤自愿认罪认罚，闫某坤、汪某燕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分别对四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理。综合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等人销售窃照专用

器材的经营数额以及销售的窃照专用器材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而造成的次生危害等情节，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根据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闫某坤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闫某飞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汪某燕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孙某勤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偷拍盗摄黑灰产业不仅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还容易成为滋生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整治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必须坚持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既要依法惩处偷拍盗摄者，也要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设备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铲除偷拍盗摄滋生蔓延的土壤。本案中，被告人闫某坤等人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的经营数额特别巨大，非法销售的窃照专用器材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衍生了参与人员广泛、被害对象众多、犯罪数额巨大的次生犯罪，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依法履职，综合本案犯罪事实及情节，恪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依法认定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的行为属于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充分体现了对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出重拳”打击的鲜明态度和对非法制售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行为“零容忍”的基本立场。

案例四、陈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于 2023 年 9 月 4 日至 10 月 2 日间，在未取得有关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将二手手机及息屏录像软件改装成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后售卖，先后销售 41 部改装设备，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 5 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 3 万余元。经鉴定，涉案送检的二手手机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裁判结果】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陈某上缴违法所得并提供财产刑担保，具有悔罪表现。根据陈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物品，非法流入社会，不仅可能侵犯公民隐私、企业商业秘密等，还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对于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现

行法律从不同层面作出了规范。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或者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构成对他人的隐私权的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将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予以处罚；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的刑事责任，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本案中，陈某自行改装并销售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生产、销售数量多，违法所得数额大，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人民法院根据陈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有效打击了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流入市场的源头。此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对于市面上的窃听、窃照设备，不要随意购买、使用；发现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

自 2021 年中央宣传部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12 个部门组织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惩治涉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等违法犯罪活动，优化新闻传播秩序、净化新闻舆论环境，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将“打假治敲”与“检察护企”相结合，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企案件，通过依法惩治涉企敲诈勒索违法犯罪，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推动构建良好文化传播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等 5 件典型案例。

案例一：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

——依法追诉漏犯，从严惩治编造虚假新闻实施敲诈勒索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郑某某，男，无业。

被告人姚某某，女，无业。

被告人胡某某，男，无业。

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22年10月下旬，被告人郑某某纠集被告人姚某某、胡某某等五人预谋通过制作负面视频方式敲诈某上市连锁冰激凌与茶饮企业A公司。2022年11月初，郑某某指使姚某某应聘到A公司江苏省徐州市门店工作。同年11月14日晚，胡某某假冒姚某某的男朋友，到姚某某工作的门店内假装和其发生争吵并在店内配料盒内小便，随后姚某某故意使用该配料盒为顾客制作饮料，郑某某同时指使王某拍摄视频，薛某在店外望风。拍摄制作负面视频后，郑某某、姚某某利用QQ软件聊天，制造该负面视频系郑某某从网络购买的假象。后郑某某与汪某某通过电话、微信与A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以在互联网曝光负面视频相要挟，逼迫A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购买该视频。因A公司报案而未得逞。

2023年3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对郑某某、姚某某、胡某某、王某、薛某、汪某某六人提起公诉。2023年6月6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郑某某、姚某某、胡某某、王某、薛某、汪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到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到三万元不等。郑某某、姚某某、王某、薛某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8月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一）积极引导侦查，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侦查并就收集证据提出意见，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固

定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因 A 公司案发时正值申请上市的关键时期，为避免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检察机关提示 A 公司注意防止类似事件在其他门店再次发生。

（二）全面细致审查，依法追诉漏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详细讯问在案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微信、QQ 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发现汪某某负责保存视频，并与郑某某共同出谋划策实施敲诈勒索，涉嫌共同犯罪，案件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追加汪某某为本案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后汪某某被抓获到案，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三）充分举证示证，增强指控效果。庭审中，针对郑某某辩解其系主动中止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出示郑某某等人与被害单位的通话记录、被害单位报警记录、被告人供述，证明郑某某等人编造虚假视频，并向被害单位索要巨额财物，系因被害单位报警而未实际获得财物，而非郑某某主动中止犯罪行为。为增强庭审指控效果，证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检察机关综合运用被告人供述、聊天记录和视频，将证据按照事前预谋、制作视频、实施敲诈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向法庭出示，让案件脉络清晰呈现于法庭。法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作出判决。

（四）参与综合治理，延伸办案效果。为护航企业发展，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区工商联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以座谈会、调

研走访等形式出门“问诊”，上门听需，畅通企业涉法涉诉绿色通道，办理 3 起侵害企业利益犯罪立案监督案件，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同时，结合企业需求，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敲诈勒索、知识产权、涉税等常见涉企犯罪和经营风险纳入普法宣传，从源头上减少企业各类诉讼隐患，降低企业被侵害的风险。

【典型意义】

依法严惩利用网络造谣抹黑、捏造虚假信息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网络信息时代，恶意制造并传播涉企虚假信息、蓄意抹黑企业，借机敲诈勒索，不仅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更危害网络公共秩序，应当依法从严惩治。检察机关办理涉案人员多、分工复杂的团伙敲诈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在案证据，紧盯犯罪关键环节，查明整个犯罪流程及作用大小，发现漏犯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及时追踪查证，实现对团伙犯罪全链条打击。对于敲诈勒索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遂犯，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案例二：宋某敲诈勒索案

——依法惩治网络大 V “有偿删帖” 型新闻敲诈犯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男，微信公众号“某某学术车”创始人、管理员。

“某某学术车”系医药行业圈内知名公号，主要发表药企爆料文章。2021年1月至10月，被告人宋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某某学术车”上发布江苏、河北等五家医药企业的不实或负面信息，在主动联系被害单位称可以删帖或者被害单位主动联系要求删帖时，要求企业签订“公关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否则拒不删帖，迫使被害企业以“公关费用”等名义支付钱款，并承诺删除负面信息、在合作期限内不再发布负面信息等从而降低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宋某以上述方式向被害企业索取共计人民币153万元。其中，被害企业A、B、C均系江苏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被害企业D、E分别系河北、山东大型制药支柱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

2022年6月24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宋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8日，海州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并责令退还被害企业损失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余元。被告人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4年4月16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一）加强引导侦查，全面查清案件事实。该案系网络“大V”以舆论监督之名，胁迫国内知名上市公司、民营药企，实施新闻敲诈行为，地域波及面广，行业影响恶劣。2021年11月18日，连云港

市公安局海州分局以宋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商请，海州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重点从两个方面引导取证：一是从合同签署的提议方、删除相关负面文章的时间节点、沟通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还原双方协商的真实过程，查实宋某实施了胁迫行为；二是核实被害企业是否有网络宣传的业务需求、宋某是否实际提供宣传服务等以确定“公关服务协议”的实质属性。2022 年 1 月 14 日，海州区检察院依法对宋某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

（二）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依法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审查起诉阶段，围绕宋某的行为是市场交易还是涉嫌犯罪、是敲诈勒索还是强迫交易的争议焦点，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对比审查认定宋某实施了胁迫行为。通过对比发布虚假、负面信息的节点与索要财物的节点，协商前后发布信息的频率与数量，证实宋某某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药企黑幕”等不实、负面信息，以“爆料”为由扩大影响力，通过明示、暗示等各种方法对企业进行威胁，并持续发帖，迫使企业支付“公关费用”才予以删帖。二是查明宋某未提供实质对价服务。通过补充调取被害企业往期签订的公关服务协议、宣传合同，查明企业正常经营中需要的合同价款、服务事项、提供服务主体，确认该案中删帖合作行为并非药企所需的正常交易行为。三是查明宋某明知发布信息的虚假性。通过调查宋某的从业时间和工作经历，发现其曾长期从事医药行业，具备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却未核实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的真假。通过调取聊天记录，发现其明知平台发

布的“药企黑幕”信息的虚假性，却主动发布不实、虚假信息迫使企业支付财物以实现非法牟利。

（三）强化庭审指控，有效证明犯罪。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宋某向五家药企索取钱款是一种商业行为，涉案企业联系宋某并没有对所谓胁迫产生任何恐惧心理，也并非基于恐惧心理才交付钱款，宋某没有非法占有钱款的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地依法举证质证、准确指控犯罪：一是商业行为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前提是自由、平等、互惠，被迫签订的无实质服务的“公关服务协议”，并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合作协议只是掩饰犯罪行为的“幌子”，本案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二是宋某发布的信息对被害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宋某明知企业的压力并借机提出签订所谓的“公关服务协议”，后既未提供实质服务，且所谓的协议服务也并非企业所需，企业支付财物系基于胁迫。法院经审理，依法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作出判决。

（四）加强沟通联动，形成网络治理合力。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偿删帖”“爆料要挟”等抹黑、侵害企业问题，检察机关会同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等单位，对自媒体运营情况联合开展风险排查、专项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跨区域推动平台落实法律法规中的“信息来源标注”“争议信息标签”等监管功能，净化网络空间。落实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建设“护企实体警示教育基地”，与涉案企业建立常态化

联络机制，发放检察长联络卡，向企业制发法律风险提示函，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典型意义】

一是准确把握以发布负面信息相要挟的有偿删帖行为性质，依法认定犯罪。发布负面信息以舆论监督之名，迫使被害方支付钱款“有偿删帖”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要从有无实施胁迫行为、交易的异常性、非法占有目的等多方面予以审查认定。对于行为人通过自媒体发布负面信息，利用自媒体受众群体、粉丝量、舆论发酵等“行业影响力”，导致被害企业难以通过公开真相、追究对方失实责任等救济手段恢复正常经营，迫使被害企业签订无实质服务内容的“公关协议”，支付“公关费用”“合作费用”以“删帖”的，应当认定为新闻敲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惩治。

二是多部门、跨区域协作助推平台落实自媒体监管，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网络自媒体新闻敲诈行为多发，侵蚀新闻媒体权威性、公信力，误导公众认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会同公安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网信部门等，协同整治自媒体利用舆论监督、虚假新闻信息进行敲诈勒索等突出问题，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平台对自媒体的信息发布、账号运营的监管义务，助推自媒体规范化、专业化运行，维护新闻传播秩序，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案例三：朱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

——实质审查“舆情服务协议”性质，依法惩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

【基本案情】

被告人朱某某，男，务工人员。

被告人孙某某，男，务工人员。

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7 年 12 月份以来，被告人朱某某、孙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人以“反传销”“防骗”为名，结伙利用网络实施敲诈勒索。该团伙利用企业存在的经营漏洞和问题，专门编写、发布标题为“某公司涉嫌以消费为名进行传销”“某公司涉嫌股权非法集资”等负面舆情文章，通过短信直接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或发布至自建的“某某观察”“某某财讯”“某某财经”等网站，供他人转载，形成对企业的负面舆情。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朱某某等人拒不删帖或者故意拖延放任舆情扩大，并明示或者暗示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快速删帖。为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被害企业被迫与朱某某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支付删帖费用，朱某某等人得手后即将负面舆情文章删除。2017 年至 2023 年，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先后

对注册地位于湖南、四川、北京等地 17 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网络信息公司进行敲诈，犯罪金额达人民币 66 万余元。

2023 年 12 月 20 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朱某某、孙某某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2024 年 3 月 26 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认定朱某某等五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至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一万元。被告人朱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四人不服提出上诉，2024 年 6 月 17 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履职情况】

（一）积极引导侦查取证，构建完整证据锁链。该案涉及企业多、时间跨度长，犯罪手段复杂且隐蔽，涉案证据大部分属于电子数据，极易灭失和篡改，证据收集、调取难度大。检察机关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围绕侦查思路与证据标准提出意见：一是紧扣犯罪特征、作案模式、资金流向，提出从收款账户反查被害企业的侦查思路；二是重点收集负面舆情文章、沟通协商记录、资金转账流向等关键证据，通过书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印证、补强，构建完整证据链，全面查清案件事实。

（二）全面查明犯罪手段，依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审查逮捕阶段，朱某某等人以舆情服务协议是市场经营、舆论监督行为提出辩解。

对此，检察机关着重审查朱某某等人前后行为关系、发布文章的真实性、涉案资金流向以及后续协议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全面查明该团伙几种犯罪手段：一是“短信直接敲诈”，即直接将“负面文章+链接”的短信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手机，诱导、暗示企业支付“费用”进行删帖；二是“舆情造势敲诈”，即通过注册、使用微信公众号、知乎等自媒体账号，搭建小型网站，大量发布并相互转载企业负面舆情文章，形成企业负面舆情压力，在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置之不理，迫使企业付费快速删帖；三是“冒名上门敲诈”，即冒用媒体记者身份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迫使被害企业与自设公司签订舆情服务协议，收取企业费用。在查明朱某某等人犯罪手段、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四人批准逮捕。

（三）依法追诉漏犯，有力指控犯罪。公安机关以朱某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移送审查起诉，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在逃。检察机关经查询、调取陈某某户籍信息及前科情况，发现陈某某因另案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尚在服刑，要求公安机关将陈某某从服刑地押解归案，一并审查并依法提起公诉。庭审中，针对被告人提出部分被害单位已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删帖，且民事案件庭审中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承诺删帖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二者系经济纠纷，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通过出示被告人发布负面信息造成的传播量、实施胁迫行为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被告人索取财物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指明所谓的“舆情服务协议”相关行为并

非合同纠纷，而是以合同为名实施的敲诈行为，部分被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的维权行为，不影响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认定。经审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并作出判决。

（四）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惩治合力。办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调查，发现此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进行敲诈在初始阶段，被害方有投诉，但因行为违法程度较轻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条件，而未被刑事处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不掌握情况而未能及时给予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为加大类似犯罪问题的预防和查处，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网信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协同推动整治网络违法乱象。

【典型意义】

一是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惩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区分并实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模式，着重从行为人有无实施威胁行为，服务协议是否实质履行、服务事项是否有客观需求和等价性等方面对“舆情服务协议”性质进行实质审查，全面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

二是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推社会综合治理。办理涉网络敲诈勒索案件，检察机关要注重加强与公安机关以及网信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行刑衔接双向机制，对于未达到刑事立案条件，但符合行政处罚

条件的，及时移交线索，协同形成打击合力，全面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有效净化网络空间，有力遏制网络犯罪蔓延。

案例四：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

——依法惩治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

【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某甲，男，系某传媒公司管理人员。

被告人罗某乙，男，个体经营户。

被告人杨某，男，系某新闻媒体记者。

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22 年 2 月，被告人罗某甲与罗某乙（罗某甲胞弟）、徐某、罗某丙、杨某、聂某某等人共谋成立网络自媒体用于编造发布互联网公司的负面消息，进而以“商务合作”之名逼迫互联网公司支付费用，实施敲诈勒索。随后，罗某乙注册“某某经”微信号及微信公众号，并在腾讯、搜狐、网易、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注册“某某经”“某某财经”等账号，由罗某甲负责自媒体的管理和与互联网公司联系，罗某甲还伙同杨某负责撰写有关互联网品牌的负面信息稿件，徐某负责审核，聂某某负责校对和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稿件及删帖，罗某乙和

罗某丙负责其他自媒体账号的发布及删帖，罗某乙还负责确认索要钱财到账。

2022年3月至2023年4月，罗某甲等人利用担任传媒公司管理人员、熟悉新闻传播活动、擅长编撰稿件的条件和优势，在网上收集素材后，片面选取争议话题有针对性进行负面叙事，通过“某某经”微信公众号及相关网络平台账号以“震惊体”式标题先后发布130余家互联网知名公司品牌的负面信息，诱骗公众点击浏览，通过恶意炒作网络热点、放大网民投诉影响等方式产生流量，迫使上述品牌运营公司主动联系罗某甲等人。被害单位提出删帖要求后，罗某甲等人提出需要支付合作费用，并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加大负面网络帖文发布力度持续施压，逼迫上述公司以“商务合作”的名义先后向该团伙支付删帖费用人民币29.6万元。

2023年11月8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以罗某甲等六人犯敲诈勒索罪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3月22日，南岸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甲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被告人罗某乙、徐某、罗某丙、聂某某、杨某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判决后六名被告人均未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一）依托侦监协作配合机制，积极引导侦查取证。2023 年 4 月 28 日，南岸区检察院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会商机制了解到该案系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严重破坏营商环境，遂应邀指派检察官介入侦查，提出具体明确侦查取证意见：一是查明涉案人员主体身份、工作职责；二是提取团伙成员商议、策划、实施犯罪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收集网络账号注册信息、发布路径等关键电子证据，全面固定涉案负面网帖的撰稿、审核、发布等流转程序；三是统计点击量、阅读量、转发量等网络传播数据，夯实证据基础。2023 年 6 月 1 日，南岸区检察院依法对罗某甲批准逮捕。

（二）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涉及 130 余家互联网企业，部分系知名企业，涉案人员较多且作案手段隐蔽。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针对罗某丙、杨某辩称不知道罗某甲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辩解，检察机关全面梳理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结合该团伙在特定营销节点密集发帖的作案时间，以及持续发布相关负面信息施加舆论压力，迫使多家企业与其合作并获得数额巨大非法利益的行为，查明行为人的敲诈勒索主观故意和名为“合作”实为逼迫的行为方式。二是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全面查清公安机关前期未移送的部分未遂事实，统计该团伙发布所有负面信息的发帖量、点击量，准确认定犯罪行为对互联网秩序的隐性危害，全面查清犯罪事实。三是依法开展认罪教育工作，有效惩治犯罪。通过追查赃款去向，促使全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全部违法

所得共计人民币 29.6 万元。对负责整体管理及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罗某甲依法认定为主犯,对参与犯罪的其余五名被告人均认定为从犯,依法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三) 加强出庭指控,强化法治教育效果。为以案说法,开展法治宣传,检察机关邀请相关单位从业人员观摩本案庭审,现场释法说理。庭审中,运用多媒体示证方式播放了各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网络引流链接等电子证据,当庭全面展示了各被告人共谋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索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过程,揭露其所谓的为了公共利益实施监督的幌子,相关证据被当庭采信。检察机关指控事实、情节及量刑建议均被法院判决采纳。

【典型意义】

一是依法准确认定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以监督为幌子的敲诈勒索与舆论监督表面上不易区分,检察机关要严格把握二者的界限,对新闻记者通过搜集、传播负面信息相胁迫,敲诈勒索企业并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要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明示或者暗示胁迫、交易的异常性、被害方给付费用的被迫性等方面,准确区分舆论监督与借舆论监督之名实施的敲诈勒索,依法准确认定敲诈勒索罪。

二是以案促治,高质效办案护航新媒体业态良性发展。在自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部分“自媒体”无底线蹭热点造流量,违反法律通

过制造以假乱真、虚实混杂的“信息陷阱”实施敲诈勒索，该类行为不仅损坏企业的商业信誉、侵犯企业的合法财产权益，更是对新闻舆论监督秩序和环境的破坏。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注重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促使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有效减轻、消除不良影响，及时为被害单位挽回经济损失，提振企业经营信心。同时，落实普法责任制要求，通过组织相关媒体从业人员观摩庭审，开展“沉浸式”的现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案例五：刘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

——依法惩治冒充记者实施敲诈勒索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甲，男，无业。

被告人曾某甲，男，无业。

其他七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被告人刘某甲、曾某甲在网络平台认识后，刘某甲向曾某甲提出以冒充记者、曝光环保问题的方式要挟索要钱财。曾某甲表示同意并拉拢曾某乙、刘某乙、刘某丙、黄某甲、黄某乙、尹某某、陈某等 7 人参与。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2021 年 6 月 10 日期间，上述 9 名被告人交叉纠集，有分有合，使用无人机等设备在河北省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保定、张家口等地对多家砂石料厂、搅拌站等企

业单位进行拍摄，然后分别冒充河北A报、河北B报等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给工商业经营者打电话，以媒体曝光或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问题相要挟，共敲诈勒索74人94次，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2.61万元。

2022年3月21日，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甲等九人犯敲诈勒索罪向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10日，河间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刘某甲等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并处罚金。九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检察履职情况】

（一）应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本案涉案人员多、案件事实较为复杂，河间市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并提出侦查取证建议：一是做好扣押手机的电子数据恢复、信息梳理工作，全面筛查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二是扩大案件侦查范围，全面收集刘某甲等人在河北省内跨地域实施犯罪的证据材料。2021年7月19日河间市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对刘某甲等九人批准逮捕。

（二）积极开展自行侦查，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系以冒充记者的方式反复多次跨地域实施敲诈勒索，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河间市检察院依法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及时开展自行侦查，查明遗漏犯罪事实，确保准确认定犯罪。一是针对审查中发现下游被告人转移赃款的数额远高于现有犯罪事实涉案金额的情况，检察机关及时开展自行侦查，通过调取、核对交易流水和交易日期，发现该团伙除公安机关

移送的46起审查起诉事实外仍有部分事实未查清，遂引导公安机关从下游犯罪入手补充侦查，最终犯罪事实增加至94起。二是针对被告人尹某某、黄某乙辩解自己未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没有犯罪故意的辩解，检察机关从行为人的日常交往、身份关系、活动轨迹等细节入手，通过讯问其他被告人，补充完善了尹某某、黄某乙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促使二人在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如实供述自己系明知曾某甲等人犯罪的情况下实施了帮助行为。

（三）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案有6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围绕量刑建议多次听取了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值班律师）的意见，刘某甲等9人均表示接受量刑建议，并在律师在场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庭审中，9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并真诚悔罪，辩护人未提出不同意见。检察机关建议法院依法没收犯罪活动使用的无人机、手机等作案工具。一审法院对检察机关认定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予采纳，9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

（四）制发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该案暴露出职能部门在环保问题上履职存在短板，监管存在漏洞。为堵塞监管漏洞，防范环境污染风险，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调研、与相关人员座谈，向环保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促使加强对污染企业的审核把关，并对涉案的74家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为督促检察建议有效落实，检察

机关积极开展“回头看”，不定期实地走访，与环保职能部门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作，助推环保部门提升监管质效。

【典型意义】

一是依法从严惩治冒充记者实施的新闻敲诈类犯罪。冒充记者反复多次实施敲诈勒索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新闻记者形象、扰乱新闻媒体的管理秩序，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将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强化证据审查，深挖犯罪事实，确保全面依法准确惩处。对于被害人主动联系的，检察机关要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以举报或者发布负面信息相威胁，结合其身份真实性、行为模式连续性、事前的犯罪预谋等综合认定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确保准确性。

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作用。公民对污染环境行为有监督举报的权利，但以举报为名谋取非法利益，既是对公民监督权的滥用，更实质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案件办理中发现政府职能部门履职存在漏洞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政部门依法履职，督促相关部门堵塞监管漏洞，促进社会综合治理，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辖区基层法院

共同发布刑事审判白皮书

为推进刑事治理现代化，以高质量司法护航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在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12月4日下午联合辖区9家基层法院召开“治罪治理并重”刑事审判白皮书发布会，共同发布12篇刑事审判白皮书，向社会通报涉电商经济类、金融经济类、电信诈骗类、交通及执法类等犯罪案件的情况和典型案例。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辖区法院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刑庭负责人及干警代表，宝山公安分局、普陀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快递、电商行业协会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参加了发布会。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为系列白皮书作序，充分肯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法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及辖区法院以此次发布会为契机，努力打造“治罪治理并重”的上海样本，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